

## 唐绍仪

唐绍仪（1860~1938），字少川，广东中山（香山）县唐家湾人。

唐绍仪自幼到上海学外语和洋务知识。1874年经清廷选派到美国留学（属于清廷派出的第三批留学生），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。1882年奉召回国，改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继续学习。1885年25岁时，开始在天津税务部门任职。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，当时袁世凯任驻朝鲜总理，交涉通商事宜，对唐绍仪十分赏识，调唐任西文翻译。

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，唐以道员随来山东，协办外交和商务。1901年官办山东大学堂成立，唐绍仪为首任校长（当时称管理总办），对大学堂的规划和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。1904年英国加紧侵略西藏，唐绍仪奉命以清朝政府议藏条约全权大臣的身份，先后两次与英国办理交涉，前后达两年之久，到1906年4月与英国签署了《续订藏印条约》。根据这一条约，英国确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，但也取得了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有关商埠的特权，1907年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。1910年任邮传部尚书。

武昌起义后，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，唐绍仪为袁的全权代表，于1912年12月18日与南方革命军全权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谈判议和。1913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，提名唐绍仪

为首任内阁总理。在此期间，唐经孙中山介绍，加入了同盟会。唐的内阁被称为“同盟会中心内阁”，唐因力图推行他的“责任内阁制”，而与袁世凯的大权独揽相冲突，只任三个多月的内阁总理即愤而辞职，到上海寓居。袁世凯的“洪宪”复辟丑剧开锣时，唐曾表示反对，致电劝袁退位。

1917年9月，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，建立护法军政府，唐绍仪南下参加，被孙中山任命为财政部长。次年5月，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，取消大元帅制，改为七总裁，唐为七总裁之一。

1920年6月，孙中山、伍廷芳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，唐绍仪在上海表示支持。粤军把桂系军阀逐出广东，唐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。这时唐认为孙中山的主张难以实现，不愿支持，没有继续任职，退居其家乡。1924年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，唐沉默。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反动政府后，聘唐为高级顾问，唐也没有前往就职。

1931年5月，汪精卫、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政府，与蒋介石争权，唐应邀参加，任常务委员。后宁粤合流，唐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。1932年1月，唐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，兼中山县县长。1936年唐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“西南政务委员会”等机构，帮了蒋介石的忙，蒋未曾报答，对蒋不满。1938年9月30日，唐留居上海寓所，被蒋介石军统特务暗杀。终年78岁。

### 王 寿 彭

王寿彭(1875~1929)，字次箴。山东省潍坊人。1875年(清同治十三年)12月生。幼承祖训，于本乡读书，刻苦砥砺。17岁时即进入邑庠。22岁，至济南任家庭教师；同年，参加了书院考试，每次考试都名列榜首。1901年(光绪二十七年)，26岁，考取山东举人。第二年，又于河南应“会试”，试中。1903年(光绪二十九年)，28岁，应“殿试”终以一甲一名(俗称头名状元)进入翰林院，授予修撰，于此供职。不久又进入士馆，研习法政。后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、实业、教育等方面，思想受到一定影响。著有《考察录》流传于世。1910年(宣统二年)，35岁，接任湖北提学使(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厅长)。此时，着手创办了“两级师范学堂”(亦即“两湖师范学堂”)，提倡代用小学制，兼署藩篆，首创预算制度，并且制定了学教独立章程，使得办学经费专款专用，为各省首创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回到北方。民国初年，王寿彭在济南山东都督府和巡按使署担任秘书、教育司长等职务。以后又去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多年。20年代中期，1925年，回到山东济南，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。以提倡经学为己任。

1926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，为顺应形势，装扮开明，被迫于6月30日下令于济南重建山东大学。山东省代理省长林宪祖亦下令省教育厅于暑假期间筹办山东大学，并以教育厅长、清末状

元王寿彭兼代校长。1926年7月24日，山东省教育厅发出指示，将山东省立农业、工业、矿业、商业、医学、法学六个专门学校，提高学习年限和水平，改建为省立山东大学，同时，又将山东省第一、第二、第六、第十等四个中学高中部学生，拨入山东大学，作为附属中学。王寿彭受命于山东都办府，8月5日到职祝事，启用校铃，挂出校牌。此时，学校经费每年为28.4万多元。共设13个系（那时称分科）。1926年8月制定了山东大学规程，明确规定了办、学宗旨和培养目的，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治校治学的规章制度。大学部共有教师71人，其中教授60人，阵容齐整，人才汇集。教师多数学有专长，且抱有“教育救国”、“科学救国”思想，与当时的我国其他高等学校相比并不逊色。

然而，王寿彭兼代省立山东大学校长不到一年时间，1927年，在山东大学重建一周年时，因思想观念较旧，有沿用陈规之嫌；且由于时局动荡、形势复杂，于是，在受到内外强烈责难下，“拂袖而去”。王寿彭为中国封建科举制度下所产生的最后一名状元，其思想体系固然离不开“尊孔读经”；但是，他在被派赴日考察时，确也接受了一些维新的思想，重视教育，积极倡办学校，特别是对省立山东大学的兴建，是有一定贡献的。

1928年4月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进抵泰安，张宗昌自知不保，出卖民族利益，勾结日帝出兵济南，制造了震动全国的“五·三”惨案。惨案发生波及潍县等地，王寿彭便携带妻眷赴天津避难。1929年因病去世，卒年55岁。

## 杨振声

杨振声(1890~1956)，字今甫，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和文学家。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，翌年留学美国，得文学博士学位，继又攻读教育心理学。1924年回国，历任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、燕京大学教授及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，1930年6月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。主要从事教育事业，同时兼搞文学创作，陆续发表一批文学作品。中篇小说《玉君》于1925年出版后，在社会上轰动一时。他的这些作品，以暴露旧社会黑暗、反映工农大众疾苦和妇女争取解放为主题，体现了“五四”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。杨振声先生在当时的教育界和文学界已经很负盛名，并被认为是“性情温和，冲默有量”，所以他做校长是十分适当的。

作为教育家，杨振声校长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师资的重要。他到任之后，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各派“兼容并包”、学术“思想自由”的办学方针，打破门户之见，广聘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。他延聘教师十分严格审慎，特别注重学术水平，曾为请到满意的教授呕心沥血，又因担心本校教授被北大、清华拉去，经受过许多“恐慌”和不眠之夜。即使如此，他也始终坚持“宁缺勿滥”的原则，决不“敷衍备数，造出的人材无用处”。如青大文学院原有设历史系的计划，“而欲对于中国史请一位好教

授，物色几及一年，犹不能得！此系即不敢开办。”由此可见其办学严肃认真的态度。

杨振声校长认为，设备完善是办好一所大学的起码条件，他把这项工作比作盖房子打基础，地基打得好，础石放得牢，将来这广厦百间，高楼千栋，才盖的起，负的住；基础不立，则将来一切计划，皆为沙土上楼阁。所以，他对教学设备极端重视。当时，原省立山大、私立青大留下的校产，除了校舍之外，其余设备极少，又不适用。而且，国立青大因系改建，不仅没有开办费，经常费也年仅 40 余万元，用这点钱办两个学院尚且不足，办四个学院尤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杨振声从实际出发，提出撙节开支、勤俭办学的方针，用节省经常费来补充设备费，逐年添置教学设备。他说：“我们惟有节省经常费来补充设备费。我们经常费能多省一文，即设备上能增加一点，也便是学校的基础上多放一块基石”，“这一文便省它百年的价值，文化的贡献。故在行政上多花一文，这一文便是虚耗，在基础上多花一文，这一文便是建设。”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青大两年就节省经费 45 万元，用于设备方面。杨振声这种勤俭办学的精神十分可贵，今天仍然值得学习与发扬。

对于诸种设备，杨振声校长特别强调图书馆和实验室的作用，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其关注至极。他认为大学不仅要有好的教师，以指导学生的研究和学习，还要有好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供给学生学习与研究上的材料与方便，“基础的基础在图书”。他极关注图书的数量与质量，又很强调管理与利用的重要。因此，他要求图书管理要科学化，尤其编目更要力求完善，以便师生查找。对于实验室，他认为，“近代科学不由实验入手，犹之农夫不操耒耜而云能耕，木匠不亲绳墨而云能量，同是一样的荒唐。”因此，在他看来，“实验室之在大学，与图书馆同其重要”。他不仅利用节支之款采购大批图书和先进仪器，而且还建造一座科学馆，使之成为学校的实验中心。

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，杨振声校长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主张，并在教育实践中加以身体力行。从严治校是他办学的主导思想。要从严治校，就必须有严格的纪律，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，使一切工作都有章可循。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庄严的最高学府。他说：“一个机关必须纪律化。一切规程使其简而易守，然后大家循序而善行之。则学校事务，化复杂为简单，治纷乱以条理。”“一切纳诸轨物。大家才能专心一志于学术上之建设，蔚然成为整肃庄严之学府。”为此他到校一年就陆续制定了学校的组织规程、原则、各部课及图书馆的章程和办事细则，各委员会规程、考场规则以至寝室规则等等，大小规章数十种。他并强调，各种规章制度既已建立，就必须严格执行，不得通融。一切校政必须按章办、事，不能任意。各种课程必须科学化地组织、不能凌乱，学校的整个计划，也要按着实际需要与经济情形，依次地向前发展。这样，才能使学校的工作有秩序地进行，也可以使学生逐渐养成有组织、有纪律、勤奋好学的习惯，形成优良的学风和校风，造就出有用的人才来。他强调切不可“误了人家的子弟，毁了国家的命脉”。

杨振声先生在任青大校长期间，十分注意发挥群体的智慧与作用，实行民主办学。他认为，各种规章制度和计划是要严格遵守与执行的，因此制定这些规章和计划的时候，就“不能不十分审慎，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”。校长即使“经验多些，见解透些，那经验也有时而穷，见解也有时而偏”。所以，必须“要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，权在校长之上，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完善”。这个“集思广益的组织”就是校务会议。当时的校务会议是由全体教授选出的代表和教务长、秘书长、各学院院长、各系系主任组成的，校长为当然主席。它既是学校的立法机构，也是最高权力机构。这样，即使校长是一个没有教育经验的人，也不至于危害学校的根本了。他虽为一校之长，但并不专权，而能

以身作则，严守纪律，认真执行校务会议的各项决议，遇事从不任便处理。他说：“要学校有法纪，第一个得先从校长做起，校务会议的决议案，校长是第一个负执行的责任与遵守的义务。”否则，如果校长不能遵守法纪，遇事以个人的私意任便处理，以为自己是个“首领”，可以出言为法，那他不仅不能督促旁人执行与遵守，而且，久之学校的事务一无法纪可循，必入于紊乱状态，这个学校就根本办不好。他提醒大家说：“一国独裁则一国必坏，一个机关独裁则一个机关必坏，这是公例。”于是他提出，他作为校长不仅“个人应当引为警惕”，同事同学也应当有些顾虑”并对其进行监督。杨振声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和民主作风，深得师生们的好评和欢迎。

对于办出本校的特色，杨振声校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对青岛的地理环境、自然资源以及山东的古物文献等，作了细致的分析，提出渐次增设海边生物学、海洋学、气象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和哲学等学系的设想。海边生物学、海洋学、气象学等，在当时皆为其他大学所未设，容易形成自己的特色。但是，由于经费关系他的这个设想直到50年代才渐次变为现实。50多年前，他就能看到这些问题，不能不说颇具战略眼光的。

杨振声校长认为文理两学院的关系极为密切，没有绝对的界限。他以心理学为例指出：心理学一般是依附哲学在文学院，但它是与理学院的生理学和生物学相依为命的。所以“不能以科学（编者按：系指自然科学）与不科学（编者按：系指人文科学）为文理的分界，更不能因分院便视为截然不同的学问”。他不仅认为文理两学院“不能此疆彼界”，而且更是“相辅而行”、“相得益彰”的。他说：“文学院的学问，方法上得力于自然科学；理学院中的学问，表现上也得力于自然科学；理学院中的学问，表现上也得力于文学美术。文学院中的人，思想上越接近科学越好；理学院中的人，作人上也越接近文学越好。”“文理本来就不能分家，

最多不过如一家两院罢了。”他的这一精辟见解，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文理科的相互关系。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“青大学则”，明确规定了文科的学生必修理科的某些课程；理科的学生必修文科的某些课程。由此可见，50多年前他对“文理渗透”的重要意义已有深刻的认识，并注意在教育实践中加以体现。山东大学1932年奉命“整顿”之后，文理两院一度合并为文理学院，后在工作发展中又复分设。

对于如何办好中文系和外文系，杨振声校长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做法。首先，他认为学文学“绝对不是墨守成规地学一国的文学就够了”，至少必须学第二国的文学，才能因比较而对第一国的文学就了解的清楚”。“中外的文学必须有相当的沟通……然后中国的新文学才有希望。”为使中外文学沟通，他甚至主张把中文、外文两系合并来办，只分组，不分系。但因学生的外语不过关，难以办到，只能使两系学生互修彼系某些课程。其次，他认为：“学文学绝对不是专念几本文学书可以有成的。因为文学的基础是建筑在深切的了解力与博文的同情心上。”因此，他强调搞文学的人应该走出“象牙之塔”来到“十字街头”，去实地观察人生的行为、情感、思想与生活。就是要把文学放在真切的人生了解上面……文学不能了解人生的深处，只等于痴人说梦罢了”。这不仅是50多年前的他对文学的深刻理解，而且也是他多年创作的深切体验。在他的作品中，主人公多是下层群众和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性，在他的笔下，饱含着对这些人物的同情。所以，鲁迅先生称他是“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”。再次，他认为，“文学不仅是学问，而又是艺术。所谓艺术者，不独是知道了便完事，又要把你得到的观念用一种最适当符号传给别人，使别人也从中受到感染。这比旁的学问又须多一层练习上的努力。”所以，他特别强调学文学必须加强练习。按照他的意见，中文系的教学十分注重练习这一环节。如教师讲文章，就要学生摩写文章；教诗词，

就让学生练习作诗、填词。这样，不仅使学生学到了知识，而且培养了写作能力。

杨振声校长特别重视办学质量。他认为“学生在好而不在多”。在他离开北平赴任青岛大学校长时，傅斯年先生曾对他说：“只要你能领导两三个学生走上学问的正路，也便不虚此一行了。”他对此言深有同感。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平时都能勤奋学习，刻苦锻炼，“不在图书馆，就在科学馆，不在科学馆就在体育场”。经过如此的 4 年，大家都是学问好、身体好的青年。如希腊人所说：“健全的心神在健全的身体里。”为了促使学生勤奋学习，保证质量，实现他造就优秀人才的希望，他主张实行淘汰制。为此，青大“学则”明确规定：“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两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。”这一规定比当时国内许多有名的大学都更为严格，因而形成极高的淘汰率。头两届学生淘汰率分别为 42.5% 及 25%。因此，学生平日学习无不兢兢业业，刻苦用功。

杨振声校长认为，大学是“社会拿出用血汗换来的钱组织的学术机关之一”。既然如此，它就应当“以学术增加人类的幸福来报答他们”！所以，他在办学中极为重视开展学术活动，进行学术交流，以发展学生的智力，提高学术水平，培养优秀人才。为此，他把每星期一“总理纪念周”时间定为学术演讲时间，并带头进行学术演讲。全校师生踊跃参加。如任之恭教授一年就做过 6 次学术演讲，王淦昌教授两年半就做学术演讲 8 次之多，汤腾汉教授在校期间曾做学术演讲 10 余次。除每周都有本校教师做学术演讲之外，他还利用青岛的地理条件，经常邀请一些名流、学者来校讲学或做学术演讲。通过这些活动，活跃了学术空气，开阔了师生的视野，各种学术社团如雨后春笋。使整个学校洋溢着奋发向上、努力探索之风。师生们建立的学术、文艺团体，有国文学会、数理学会、数学讨论会、物理读书会、化学会、生物学会、励学社，刁斗文艺社、素丝社、征程文艺社、潮音文艺社、文刊编

辑社、新文学会、大众科学社等。有些社团还出版报刊，其中影响较大、曾经引起学术界注目的，是励学社出版的综合性杂志《励学》和刁斗文艺社出版的文艺刊物《刁斗》。

在杨振声校长的苦心经营下，青大初具规模，一切都已纳入正轨，正要奋力腾飞，然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校内矛盾重重，杨振声辞职，青大也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。

杨振声任校长两年，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为学校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是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奠基者，也是山大校史上富有创造性、开拓性和甚孚众望的校长之一。他的许多办学见解、主张和做法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研究和汲取。对于为学校做出贡献的领导和校长，大家是不会忘记他的。

## 赵太侗

赵太侗先生于 1932~1936 年,1946~1949 年,两度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,时间虽都不长,但对于山东大学的发展和提高,也有多方面的建树,曾为学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,受到教育界的好评。

赵太侗 (1889~1968),原名赵海秋,又名赵畸,太侗其字,后来即以字行。1889 年生于山东省益都县(今青州市)东关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家庭。幼年的赵太侗聪颖勤奋,刻苦好学,以优良的成绩考入青州中学(后为省立第十中学,今青州一中)。

1914 年赵太侗先生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,四年毕业后在济南任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英语教师。1919 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美,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,后入该校研究院专攻西洋戏剧。此间和留美的闻一多、涂沅沅、梁实秋等交往甚密,共同组织中国京剧在美公演,受到美国华侨的好评。1925 年结业回国,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和戏剧系主任,并被北京大学聘请为讲师,主讲戏剧理论课程。

1928 年夏,国民党军队进抵济南,奉系军阀张宗昌败逃,设在省城的省立山东大学停办。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,报请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,成立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,拟重新组建国立山东大学。赵太侗先生被提名为筹委会委员,由南京返回

山东。1930年6月筹备工作完成，使用原私立青岛大学校舍（即德军所建的俾士麦兵营），组建成国立青岛大学。首任校长为蔡元培推荐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杨振声，赵太侗先生辞去省立一中校长的职务，专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和教务长，时年41岁。1932年春，教育部指令国立青岛大学进行整理，同意杨振声辞职，任命赵太侗为校长，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。

赵太侗任校长后，文、理两院合并为文理学院（不久仍分开），撤销教育学院，在济南设立农学院（暂不招生），筹建工学院（1933年成立），由杜光坝任教务长，其他教学组织负责人基本未变。除坚持杨振声的“兼容并包，学术民主”的办学方针外，他加强学校下述四个方面的建设，并身体力行，做出成绩。

第一，建立阵容整齐、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，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。赵太侗认为办好大学，教师的力量和科学水平起着重要作用。他有一个小本子，专记各门学科的专家和学者，了解对方情况后，或者亲自聘请，或者托人代聘。国立山东大学经费虽少于其他各校，但教师的薪俸与其他各校基本相同。而且每聘一般定期为二年或三年，这在当时生活动荡、谋职困难的情况下，可使受聘教师思想稳定。教授在校任职连续三年者，可享受半年假期，或从事专题研究，或出国考察，经过申请学校可给予适当的补助。至于青岛的气候、地理位置、交通等优越条件，当然对教师也有不小的吸引力。

按当时国立山东大学的师资阵容和水平，除北大、清华外，较之其他国立大学都无逊色。新聘教师还处于年富力强的阶段，他们工作认真，使国立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得到不断提高。

第二，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校务委员会和各种专门委员会，发扬民主，集思广益，实行教授治校。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主席，由教务长、秘书长、各学院院长、各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。学校的重大问题和兴革事项，均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决议，

校长负责组织贯彻执行。校务委员会既是立法机构，也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。这样教授们均能积极地关心学校，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意见，保证了学校的工作在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运行。此外，在校长领导下，还设立了科学研究、教师聘请、校舍建筑、教学设备购置、毕业考试等专门委员会。这些委员会的委员，也都从教授中聘请。他们不但能把与教学有关的工作处理得更稳妥，更完善，而且也发挥了教授治校的作用。国立山东大学那时工作和谐，目标一致，大家同心同德，教学、科研、学校建设进展得都较快，应当承认，是实行这种领导体制的结果。

第三，撙节行政开支，添置教学设备，改善教学条件。当时全国各校名为国立大学，而经费来源主要靠地方拨款。富省多拨，穷省少拨，当时青岛大学只有 50 万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赵太侅校长继续励行勤俭办学的方针，把学校行政开支压缩到只占全部经费的六分之一，把行政人员精减到只占全校教师的五分之一。把节余的经费存入银行生息，用以添置教学设备。同时发扬自力更生精神，师生自己动手制做实验器材，如物理系修制仪器，化学系自制药剂，生物系采集标本等等。从 1933 年起，使用银行存款，申请教育部补助，陆续建成科学馆、化学馆、工学馆、水力实验室等等。至 1936 年图书馆藏书增至 40 万册，教学仪器增至 1200 余件，化学系自制的化学试剂，能对外供应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教学条件得到大大改善，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。而且这种厉行节约，勤俭办学的精神，逐步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。

第四，培养严谨勤奋、基础扎实、敢于开拓的优良学风。赵太侅校长认为学风是学校的精神支柱，而好学风的形成，又必须是各级领导以身作则，带动全校人员自我严格、自我追求的结果，所以他要求教师不但要完成教学任务，而且在科学研究中要不断创新，取得成果。对学生，要求好的学习成绩，根据《学则》的规定，选优汰劣，绝不稍宽。为了确保毕业生的质量，对每届毕

业班都设立毕业考试委员会，办理毕业考试和审核成绩。

1934年4月，教育部派员到各国立大学视察，对山东大学教学中的严谨，研究中的创新，建设学校中的勤俭节约，培养人才中的重视质量等等，甚为满意，发出表扬的训令，使山东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声誉。

1936年，由于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不断高涨，赵太侗校长受到上峰的指责、地方的刁难，拒绝拨给协助经费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，于当年8月愤而辞职，随即离校任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赵随北平艺专迁移至湖南沅陵，不久辗转至重庆。在陪都先后担任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委员兼剧本整理组主任、国立编译馆编纂、中央训练委员会第三处处长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、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等职，前后达八年之久。

抗日战争中，国立山东大学内迁至四川万县，旋即奉令停办。师生和图书仪器并入中央大学等校。八年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2月教育部批准国立山东大学仍在青岛复校，任命赵太侗为校长，再次主持山大工作。此时复校工作千头万绪，百废待举，他独具创见地抓住四个方面急待解决的问题。

第一，收回校舍。青岛沦陷后，国立山东大学校舍被日本人占用，胜利后又被美军接收作了兵营。收回校舍是复校中最急迫、最关键的一步，而且又是一项复杂、棘手的工作。为此，他电召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八年之久、抗战前任山东大学教授、时在岭南大学任教的周鍾岐教授到重庆，聘为总务长，先期去青岛，办理收回校舍事宜。赵太侗6月到青岛，亲自与驻青美军司令柯克谈判，又陆陆续续收回一批校舍，勉强开学。直至1948年底美军从青岛全部撤走时，校舍才得全部收回。

第二，系科设置。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设有文、理、工三个学院共八个系（农学院未招生）。复校后赵太侗校长考虑到，胜利伊始，各业待举，而培育人才尤为急务。经请示教育部同意，设

立文、理、工、农、医五个学院共十六个学系，以广育人才，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。因之，复校后的山东大学较前有了发展，规模得到扩大，成为一所有各门学科的高等学校。由此可见，赵太侗校长对办学是热心的，也是颇具远见的。

第三，延聘师资。胜利初届，各大学均处于恢复阶段，纷纷争聘教师。赵太侗接任校长后，捷足先登，早发聘书，并能礼贤纳士，登门教请。当时应聘的有：朱光潜、老舍、游国恩、王统照、陆侃如、冯沅君、黄孝纾、丁山、赵纪彬、杨尚奎、萧涤非、丁西林、杨肇、童第周、曾呈奎、王普、郭贻诚、王恒守、李先正、刘遵宪、朱树屏、刘椽、阎效复、杨宗翰、郑成坤、李士伟、沈福彭、穆端五等等。组成这样高水平的教师阵容，赵太侗确实是费尽了苦心。上述教师除老舍出国、朱光潜因病中途辞聘外，其余均在 1946 年秋和 1947 年春到校。复校后，国立山东大学由于聘到高水平师资队伍，不但促进教学、科研的提高，而且为 50 年代的山东大学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。

第四，全国招生。复校后的国立山东大学的招生工作，仍然坚持严要求、重质量的传统。同时赵太侗校长认为学术无地方性，学生来源越广，在相互切磋和陶冶中，越能培养优秀人才。当年秋季在北平、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、济南、青岛八个城市设立招生办事处，当时报考的学生共 5871 人，经过初试和复试，录取本科学学生 518 人，先修班学生 185 人，达到了广收天下英才而教之的程度。可见对招生工作是很有见地的。

赵太侗先生青年时代，追求个人奋斗，旨在成名成家。壮年时代进而关心国家命运，以办好学校、培育人才、实现教育救国为己志。他在两任山东大学校长中，对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，不甚理解，认为学生只有读书成才，将来才能救国，所以采取劝服、说服等办法。但是，他对学生又寄予无限的希望，十分关心和受保护。1934 年 8 月，物理系学生俞启威（即黄敬，中共地下党员），

被青岛当局逮捕，押解济南。赵太侔校长闻讯，赶到济南，力请国民党山东省主任委员李文斋、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出面保释，并亲领俞启威返回青岛，送给旅费，密属速速远走。1946年10月，教育部给赵密电，指令查明中文系教师徐中玉的“共党”嫌疑具报，赵将密电内容告知徐中玉，令其避开，从而保住了徐中玉。

1947年到1948年，赵太侔先生对在爱国民主运动中两次被逮捕的200名学生，采取营救措施。亲自修改营救学生文稿，通过校务委员会作出决议，被关押学生一律不作旷课论，保留他们的学籍。被捕学生从看守所中传出信函，请他以校长地位，呼吁社会贤达进行干预，他应诺予以交涉。

1949年4月，在青岛解放前夕，有人劝赵太侔出走南逃，也曾接教育部密电，嘱令随驻青海军南下广州。但赵留意已决，乃秘密住进医学院附属医院第四病房（该病房不对外开放）。青岛绥署主任刘安祺南逃时，奉命到绥远路赵的宿舍胁迫同行，无奈已人去楼空。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青岛，赵太侔先生迎来了中国大地的黎明，和国立山东大学师生共庆解放。

赵太侔先生性情沉静敦厚，律己而又自信，细心而又果断，鲜言寡笑，不尚掩饰，不作无聊应酬。在两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，清廉为怀，淡泊自持，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。

解放后赵太侔先生任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。1958年山东大学奉命迁校济南时，他表示愿留青岛。在山东海洋学院任外语教研室教授，院务委员会委员，还任政协山东省常委、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及民革山东省常委和青岛市副主任委员等。晚年致力于汉字改革的研究工作，写有《汉字改革方案》、《汉字新法打字机拟文》等文稿，受到国务院高等教育部、文字改革委员会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的重视。可惜，在“十年动乱”中文稿全部丢失。1968年4月，在“四人帮”极“左”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含冤逝世。

1979年10月，山东海洋学院为赵太侔先生举行平反昭雪追